

教育责任的语法错置：当“操控者”脚本遇见生成过程

家长为何越负责越焦虑？问题可能不在责任太多，而在责任被写成了“操控结果”的语法。本文把教育责任从操控者脚本移回生成条件的守护。

作者 王德生 · 约 1.9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4日

摘要

当代家庭教育焦虑在AI 时代呈现出一种反直觉的形态：当技术拆解了竞速的确定性目标后，焦虑并未消退，反而以空转状态持续加剧。既有研究主要从“目标焦虑”和“位置焦虑”两个路径进行解释，本文指出它们共享一个未经充分审视的预设——将家长视为“教育的操控者”。通过追踪中国城市基础教育三十年来减负政策的累积效应、家校互动中微观运转的日常实践，以及AI 技术介入后的新型互动形态，本文揭示：焦虑的深层根源，在于家长被一套制度性的“操控者”脚本锁入了一个存在论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必须以操控的语法去回应一个在本质上不可操控的孩子的生成过程。由此产生的日常运转，蜕变为一种持续的本体论伪证：运转在形式上证明“我在负责”，在实质上反复暴露“我控制不了”。这一裂缝的张力与运转之间形成自我锁定的机制。AI 时代的技术升级，不仅未能消解这一悖论，反而通过替代“教”的环节而剥除了维持操控幻觉的形式外衣，将不可操控性公开化。在松动路径上，本文拒绝简单倡导“换一个新脚本”的规范性呼吁，转而从认知松动在个体日常裂缝中的偶然发生、制度脚本的语法替换、以及守护者实践的可能形态三个层次，展开一种发生学式的分析，指明松动的关键不在于告诉家长“应该怎样”，而在于集体性地为不以操控为核心的教育责任形态提供正当化条件。

关键词：家庭教育焦虑；操控者预设；生成过程；本体论伪证；伪证生产场

一、引言：当焦虑在两个解释之间滑落

过去三十余年，家庭教育焦虑在中国的公共讨论中持续占据着一个奇特位置。它被广泛承认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事实——大量调查反复显示，相当比例的城市父母长期处于对子女教育的高度担忧之中——同时它也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一个“可以理解”的心理反应：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父母担心孩子落后，因此焦虑。这种理解的朴素版本可以在无数日常对话中找到：“现在竞争这么激烈，谁不焦虑？”它的学术版本则分布在人力资本理论（焦虑来自对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不确定性的感知）、风险社会理论（焦虑是现代性风险个体化的产物）以及影子教育与阶层再生产研究（焦虑是阶层地位生产的驱动力）中。这些理论各有侧重，但它们共享一个深层预设：焦虑的根源是一个存在于外部的目标——更好的教育结果、更理想的阶层位置、更确定的未来——而焦虑是驱动家庭向这一目标前进的推力。

近年来，一种新兴的解释路径开始松动这一“推力”框架。它的起点是一个经验性的反直觉现象：当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性地拆解了“知识传递—标准化训练—学历兑换”这条传统路径的确定性，当竞速的终点在逻辑上已经变得模糊甚至消失，焦虑并未随之消退。相反，它呈现出一种“明知无效却停不下来”的空转形态。面对这一现象，“位置焦虑”论被提了出来：焦虑的本质不是对外部目标的担忧，而是家长被一套社会期望结构架在了“唯一兜底者”的位置上——这一位置既是教育决策权也是最终责任，由此形成一股持续的结构性的压力；家长为回应这一压力所展开的日常运转——打卡接龙、陪读监督、资源搜集比对——则在试图缓解压力的同时，以“证据生产”的方式不断再生产着它，从而形成闭环的自我锁定机制。AI时代瓦解了目标，却没有松动位置。

“位置焦虑”论将分析重心从个体心理层面转移到社会结构层面，有效解释了为什么旨在减轻压力的“减负”政策在某些条件下反而加重了家长负担——政策砍掉的是运转的外部工具，却没有松动“兜底者”的位置本身。然而，正是在这里，一个更深的问题浮现了：为什么这个位置是如此的令人不安？仅仅因为它“负担太重”吗？如果只是负担问题，那么理论上，增加承受力、重新分配责任、建立明确边界就足以从根本上缓解焦虑。但经验事实并非如此。许多家庭在减轻了具体的运转负担（比如孩子进入高年级、课外班减少、AI辅助使辅导简化）之后，焦虑并未随之消退。它转移了形态——从“我怕教不好”转向了一种更模糊、更难以命名的困扰：“我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

这道困扰指向了一个比“负担过重”更根本的问题。负担是量的问题：太重了，可以减；卸不掉，可以重分。但如果你被要求去做一件事，而这件事本身在存在论上就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难度太大，而是因为任务的性质与你要操作的对象在范畴上不匹配——那么，不论你多么努力、资源多么充裕、负担减轻到多低，你都无法真正完成它。你只能表演完成。而这个表演，会长出它自己的困惑、愧疚和自我怀疑。

本文要论证的正是这一点：家庭教育焦虑的根源，不在于家长被锁入了一个“负担太重”的位置，而在于她被锁入了一个她在存在论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不是她自己选的，而是制度性

地建构的——她被建构为“教育的操控者”，被期待像项目的总负责人那样去运作：设定目标、分解任务、监督执行、评估成果、对偏差负责。但她面对的对象——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不是一个可以被工序化分解、被从输入端操控的生产过程。教育是一个生成过程：孩子在自己的认知节奏、情感反应、抵抗方式和偶然性遭遇中，自己生成自己。这里有一个根本的、不可被操控的自主内核。制度对家长的操控者期待，撞上了这个内核。不是“没撞好”——是彼此排斥的逻辑，在同一套日常实践中被强制缝合。

这种缝合要求家长必须持续做出一种表演：在公开场合表现得像一个操控者，有规划、有监督、有证据；但在内心深处，她从与孩子的日常互动中反复确认自己根本操控不了。每一次打卡上传作业，既在说“我在负责”，也在制造一份她自己内心知道不碰根本问题的伪证。一次可能是偶然，两次可能是例外，当这种伪证生产成为日复一日的职业性动作时，它就不再只是一个外部行为，而成为一种对她自身存在状态的持续扭曲——她必须向世界和自己证明，她是那个她并不真的是的人。这个被制度建构出来的、但个体无法真正占据的“操控者”身份，正是当代家庭教育焦虑的真正温床。

本文将这一判断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二节首先回到制度史：追踪“操控者”期待是如何在过去三十年间通过一系列教育政策的累积效应被生产出来的——不是任何一条恶意设计的制度蓄意制造的，而是每一次旨在“减轻某一方面负担”的政策，在升学评价的选拔逻辑并未同步改变的前提下，伴生着一个被转移的责任空间，这些空间层层叠加，最终把家长从“配合者”推到了“兜底者”的位置上。同时，本节从教育哲学和学习理论的既有共识出发，论证教育作为一种生成过程，其不可操控性不是一个经验烦恼，而是一个结构性的存在论事实。第三节进入微观互动：借助家校互动中的日常场景（打卡接龙、检查作业、辅导学习），仔细剖析“操控者”脚本如何驱使家长制造伪证，而伪证又如何在她内部生产出一种独特的、混合了烦躁、愧疚与自我质疑的心理状态。同时，本节分析AI时代的新效应：技术如何以两种看似矛盾的方式同时运作——一面提高运转的效率，一面剥除维持操控幻觉的形式外衣，将家长的不可操控性公开化。第四节讨论松动路径：拒绝简单倡导“换一个正确的脚本”的规范性呼吁，而是从认知松动在社会裂缝中的偶然发生、制度脚本的语法替换、以及守护者实践的可能形态三个层次展开分析，指明松动的条件不是个体的觉悟，而是集体性地为不以操控为核心的教育责任形态提供社会正当性。结论部分重申核心判断，明确其适用范围与阶层边界，并给出理论的证伪条件。

二、“操控者”的建构：从制度累积到存在论事实

（一）被转移的责任：减负政策三十年的累积效应

家长何以被建构为“教育的操控者”？这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文化事实，而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日常实践的累积效应被历史性地生产出来的。追溯这个过程，有助于理解：不是某一项单独的政策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而是三十年间多次改革在升学评价逻辑未同步改变的前提下，逐层叠加，最终把家长推到了一个她自己无法选择的位置上。

起点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推行的一系列“减负”政策。这些政策的直接目标是控制学生的在校时间和作业总量，减轻课业负担。但它们的实际运作逻辑远比目标复杂。以作业量控制为例：当学校被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时，表面上是学生的负担减轻了。但在升学评价仍以知识掌握和解题熟练度为核心选拔逻辑的前提下，每一个被减掉的练习量，在竞争话语中都被迅速地、自动地翻译为一个“被暴露在竞争风险中”的缺口。政策砍掉了学校提供练习的合法性，但没有砍掉练习在应试竞争中的必要性。于是，这个“谁来补”的缺口就产生了。它不是任何一条政策主动指定的，而是政策干预与未变的评价体系之间的裂缝自然长出的。

最初，这个缺口可以通过校外培训市场来填补。但2021年“双减”政策全面推行后，培训机构的供给被大幅削减。过去可以由学校覆盖、由机构分担的教育功能，被进一步压缩进家庭的内部空间——而家庭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继续向外转嫁的出口。这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而是一个持续二十多年的累积过程。每一项新的升学加分项——特长、竞赛、综合素质评价——都在家庭的自决空间里增加了一个“可以做”的选项；而“可以做”在社会竞争中被迅速转译为“应该做”，“应该做”再被进一步内化为“不做就是失职”。到了“双减”之后，家长不仅被预期要为孩子的学业兜底，还要为综合素质、特长发展、社会实践——一系列不断扩大的“全面成长”指标——提供条件、做出规划、保留证据。

在这一层层累积中，家长的默认身份发生了静默的转变。早在上世纪末，家长在公共话语中主要被定位为“配合者”——配合学校的教学安排，在家督促孩子完成学校布置的任务。那时，教育质量的首要责任人是学校。一个孩子学业表现不佳，首先被问的是“学校怎么教的”。到了今天，同一个问题首先被翻译为“家长在家有没有盯好”——教育质量变成了家庭需要自证的功课。家长不再是配合者，而成了兜底者。而“兜底”这个词本身，已经暗含了操控的逻辑：当所有其他环节都可能出问题时，你是那个最终要确保整个系统不出问题的人。你不是过程中的一个参与者，你是全过程的总负责人。

（二）生成过程不可操控：一个被遮蔽的存在论事实

正是在这里，需要引入一笔来自教育思想本身的实质性论证。它要回答的问题是：把家长建构为“操控者”，为什么是错的——不是在道德上错，不是在政策效果上错，而是在存在论意义上，它与教育这件事本身的性质构成了范畴冲突。

教育不是一个可以被拆分为标准化工序的生产过程。它不是来料加工——你给一个原材料（孩子），设计一套工序（教学方案），执行之后产出一个符合规格的产品（成功的成年人）。教育是一个生成过程。这个判断，不是一个漂亮的哲学隐喻，而是教育理论和学习科学一个多世纪以来反复确认的核心洞见。

杜威在二十世纪初就论证过，真正的学习不是外部灌输的结果，而是学习者在与环境的持续互动中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教育者可以提供条件、设计情境、激发兴趣，但无法替代学习者自身内部的建构动作。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建构过程的自主逻辑：儿童的认知结构不是被动接收外部信息的容器，而是一个不断通过同化与顺化来重新组织自身的自组织系统。这个系统有自己的节律、自己的阶段性跃迁、自己对特定经验类型的敏感期——外部干预如果不顾这些内在节律而强行推进，不仅无效，反而可能制造认知冲突与情感抗拒。维果茨基虽然强调了社会互动在认知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但他提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恰恰也预设了一个不可被外部操控者单方面决定的过程：最近发展区是孩子“在成人或更有能力的同伴协助下能够达到”的区域，而不是“成人可以代为完成”的区域。协助之所以是协助，恰恰因为它以孩子的主动建构为前提——成人搭的脚手架，孩子必须自己爬。

到了当代学习科学，这一洞见得到了更精确的表述。学习被理解为一种“生成性”过程：学习者不是接收信息的容器，而是通过将新经验与已有知识结构进行主动联结来“生成”新的理解。这一生成过程有其内在的不可预测性：同样的教学条件、同样的学习材料，在不同学习者身上会引发不同的建构路径，产生不同的理解深度，导向不同的认知结果。因为每一个学习者都是带着自己独特的已有经验、认知风格、情感状态和兴趣偏向进入学习过程的，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道不可被外部操控者穿透的“生成界面”——你可以向这道界面输入信息、给出反馈、提供支持，但你无法替代界面那一侧正在发生的生成性建构。

这就是“生成过程不可操控”的准确含义。它不是一个经验性的烦恼（“这次我没教会”），不是一个有待克服的技术困难（“等我找到正确的方法就能操控”）。它是一个存在论判断：教育作为生成过程，其内在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被任何外部行动者以操控工序的方式完全决定。这不是说外部条件不重要——恰恰相反，正因为生成过程是自主的，外部条件（资源、氛围、关系、反馈的质量）才变得至关重要。但“重要”不等于“可操控”。你可以为一个正在生长的植物提供阳光、水分和土壤——这些条件不可或缺——但你不能操控它的生长。生长的动力和逻辑来自它自身。教育者的任务，从来都是守护那些使生成得以展开的条件，而不是替代生成过程本身。

这里必须立即做一个澄清，以防一个极易滑入的浪漫化误读。说“生成过程不可操控”，不是在赞美某种自发性的奇迹，不是在说“你只要放手，孩子就会按照某种内在的、美好的天性自然长成理想的样子”。生成过程不保证任何特定的结果。它可能走向创造，也可能走向消沉；可能生成坚韧，也可能生成逃避。它只是一个发生学事实——孩子的成长在存在论意义上是自主的、不可被外部操

控者从输入端完全决定的——而不含有任何规范性的乐观许诺。这个事实本身，并不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它有一笔极要紧的、否决性的力量：它否决了“操控者”位置的合法性。它告诉你，不管你花多少时间、投入多少资源、设计多么精密的方案，你都无法以操控一个工序的方式去操控一个孩子的成长。这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技术难题——它不能被“解决”，只能被正视。

（三）裂缝的形成：当制度预设撞上存在论事实

现在，把前两笔拼在一起，就看见了那道裂缝的全貌。

制度这一侧，通过三十年的减负累积效应，把家长建构成了教育的兜底者、全过程的总负责人。她不仅要为孩子的学业成绩负责，还要为综合素质、特长发展、心理健康——一整套不断扩张的“全面成长”指标——提供规划、投入资源、保留证据、兜住结果。她被期待像一个项目总负责人那样运作：设定目标、分解任务、监督执行、评估成果、对偏差做出解释。

但教育这一侧，作为一个生成过程，其核心特征恰恰在于——它不可被以操控工序的方式完成。孩子不是在家长的监督下学会的，而是在他自己与材料、与问题、与困惑、与某个瞬间的豁然开朗之间学会的。他的成长，不是在家长的规划中完成的，而是在他所经历的挫折、他所做出的选择、他所建立的关系、他所遭遇的那些无法被预先设计的偶然事件中，一点点凝结成形的。家长可以为这一切创造条件，可以陪伴，可以回应，但她不能替代。因为孩子那个正在生成自己的主体，而不是被操作的客体。

这两侧在同一套日常实践中被强制缝合。制度的强制性来自外部：如果你不按照操控者的脚本来运转——不打钉、不规划、不记录、不追踪——你将被社会目光判定为“不负责”。你在家长群里的沉默，会被读作缺位；你对孩子学业的不完全掌控，会被归因为你没有做到位。这是一个强大的规范性惩罚机制。但内部的反馈却告诉你以操控者的姿态运转根本做不到位：你检查了他一周的作业，期末考试还是丢分在你反复纠正过的题型上；你规划了两年的课外班，他告诉你他从头到尾都在忍受。你不是不努力。你每天都在生产“我在负责”的证据。但你也每天都在生产那份证据时，反复确认一个你无法公开承认的事实：你操控不了。

这就是那道裂缝的日常形态。家长被置于一种在存在论上不可能完成的规范之下。她不能公开说“我操控不了”——因为在现行脚本里，这句话直接等同于“我不负责”。她也不能真正完成操控——因为生成过程根本不吃这套。她必须在这两个“不能”之间，找到某种可以过得去的姿态。日常运转——打卡、陪读、规划、比对、检查——就是这个姿态。它在形式上满足了“我在管”的要求，在实质上永远无法抵达“我能管”的证明。每一次运转，都在接触中同时做了两件事：它短暂地平息了外部追查（有证据了），却也在内部加深了那个裂缝——因为运转的精细化程度越高，它与生成过程的自主逻辑之间的错位就越明显。当AI把运转的效率推到极致时，这个错位终于被推到了前台。

三、伪证的日常生产线：从家校互动到AI时代的裂缝公开化

（一）一次打卡的解剖

为了看清这道裂缝是如何在日常运转中被反复激活的，需要观察一个具体的微观场景。以下案例基于对东部某省会城市一所公立小学四年级家长微信群的持续追踪，聚焦于一位母亲在家校互动中的一次典型行为。材料来自半结构化访谈和家长群消息记录的分析。

某晚九点，班主任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今天检查了孩子们的阅读记录本，大部分同学完成得不错。但有几本记录过于简单，只抄了书名和页数，没有写任何自己的思考。请家长们今晚翻一下孩子的记录本，如果没有写思考的，请督促孩子补上。我们明天一早会抽查。”

消息格式本身值得注意。它采用了“标准公布—不点名—要求家长检查”的三段式。这个格式的规范性力量，不在它点出了谁，恰恰在它没有点出谁。因为它让每一个阅读这条消息的家长，都立刻进入了“我的孩子是否在被点名之列”的不确定性。不明确指向，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处于潜在的被审查区内。班主任不需要真的抽到你的孩子——她只需要让你无法确定你不会被抽到。这就是权力通过制造不确定性来驱动的典型方式。

消息发出后，家长乙（母亲，企业行政人员）的反应过程在事后访谈中被详细回溯。第一步：心里一沉。她不记得上次看孩子的阅读记录本是什么时候。孩子每天晚饭后有固定的阅读时间——她要求孩子读四十分钟——但这四十分钟她通常在厨房收拾、处理手机上剩余的工作消息、或者自己喘口气。她承认，她很少真的去翻那本记录本。第二步：翻书包找记录本，翻开——最近五次记录，全部只有书名和页数。第三步：混合情绪涌上来。自责——她知道自己本该检查的；烦躁——她本来已经累了一天，打算孩子睡了之后安静待一会儿；如果现在让孩子自己补写，会拖到很晚。第四步：她坐到书桌前，在网上搜了两条这本书的读后感，略加改写，用孩子的笔迹抄了上去。第四步之后，记录本合规了。明天即使抽到她的孩子，不会有任何问题。

现在不把这个行为称为“自欺”或“应付”，而试着从它的内在时间结构去看它在制造什么。

它制造了一份证据。这份证据在一个层面上是真实的——记录本上确实有了思考，形式上合规了。它在功能上完美地回应了外部要求。但它同时制造了另一层不可见的产物：母亲心里清楚，那几行字不是孩子写的，是她在疲惫中上网搜的。她不知道孩子最近在读什么书，不知道孩子对这本书有任何真正的想法，她也没有在这个晚上试图去了解——她用了十五分钟解决了一个身份危机，而这十五分钟恰恰证明了她对那个本应被“监督”的学习过程有多么不在场。

这不是个案。在追踪观察的不同家庭中，类似的操作反复出现。它的共同结构是：家长在被制度预期逼入“必须证明尽责”的紧迫时刻，用一个操控者的手法（代劳、代写、美化数据）制造了一份证据，而这份证据在完成外部提交的同时，也向制造者自己暴露了一个她试图回避的事实——她

操控不了。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她“做错了”——她很清楚按“正确的教育方法”应该让孩子自己写思考、哪怕慢一点、哪怕不完美。关键在于，那个正确的做法在这个时刻意味着：可能要花上四十分钟、可能引发一场母子争吵、可能最终孩子还是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而明天早上记录本还是空白的，她还是没有完成老师要求的那份“督促”。她选择抄，不是因为分不清对错，而是因为在这个时刻，抄是唯一能让她同时满足两套要求的方法——外部的要求（明天有记录可查）和内部的要求（今晚不要再折腾了）。这个“抄”，正是那道裂缝的栖息地：她被迫以操控者的姿态去处理一件她心里知道不能这样处理的事。

那么，有没有可能不抄？在观察中，确实看到另一些家庭的处理方式。一位母亲在类似情境中（作业本上错误太多，老师要求家长“辅导纠正”），选择不直接告诉孩子错在哪里，而是请孩子自己再读一遍题目，然后问：“你觉得这个答案对不对？为什么？”她花了四十分钟，孩子自己找到了大部分错处，剩下的两个，她提醒了一下。第二天，作业本上依然有一个题被判错。但她没有那种“我已经控制了局面”的短暂安心，也没有那种“我又在糊弄”的内疚。她有的是一种不确定的平静——她知道她做了她作为守护者该做的事（让孩子自己面对问题），但结果依然不完全在她控制之中。她接受这个不完全。

差别不在于方法——“让孩子自己找错处”也是一种方法，可以被任何家长学习。差别在于，那个采取这种做法的母亲，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没有试图用一份完美的证据来同时安抚外部审查和内部焦虑。她接受漏洞的存在。而接受漏洞，在现行的家校互动脚本中，是一件极难长期维持的事——因为漏洞总会在某个时刻被放大为“你不够负责”。今天这个老师可能没有追责，下个老师会。这个学期可能蒙混过关，下个学期不会。那个母亲之所以能维持这种不确定的平静，靠的不是她一个人的觉悟，而是她所处的微观环境中偶然的、暂时性的条件——比如这位老师恰好不那么看重作业纠错率，或者她的孩子恰好成绩不错以至于漏洞不容易被看见。当这些条件改变时，她的平静随时可能被回收进焦虑的系统里。

（二）运转如何制造伪证：一个结构性的自我锁定

把上面这个个案打开，可以看到一套运作机制。家长被制度性地架在一个位置上——必须表现为操控者，以回应学校的要求、维护在家长社群中的身份正当性、安抚自己对“是否尽责”的不安。日常运转——打卡、陪读、检查、规划、比对——就是这种表现的具体形式。每一次运转，都在同时产生两种产品。

产品一是一份可见的证据：打卡记录、辅导痕迹、学习报告、规划的课外班列表。这份证据被提交给三方收件人：老师（“我在配合”）、其他家长（“我属于这个尽责共同体”）、和自己（“我做了我该做的”）。每一次提交，都在形式上完成了责任的履行，短暂地平息了外部的追查和内部的焦虑。

产品二是一种不可见的、但被家长私下体会到的挫败感：孩子并没有因为打卡而变得更主动、那些被纠正过的错误下一次还犯、规划好的课外班上了一个学期孩子说不想去了、AI学习报告上的数据看起来漂亮但她不知道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份挫败被提交的收件人只有一个——她自己。每一次，都像一次对同一个事实的重新确认：你真的操控不了。

现在，这两个产品进入了一个相互锁定的循环。产品一在形式上证明了“我在负责”，它缓解了外部的压力。但产品二在骨子里制造了新的不安——因为它提醒她，她的负责并没有触到那个真正重要的东西，孩子的成长还在她够不到的地方运转。这个不安反而驱动她，去做更多的运转来平息它：再检查一次、再规划一门课、再下载一个新的学习软件。更密集的运转制造更多的证据（暂时缓解），也制造更深的挫败（持续积累），从而推动下一轮运转。这就是自我锁定的机制：运转不是因为有效而持续，而是因为每次运转同时制造了焦虑和焦虑的暂时缓解，使得停止运转变得比继续运转更难——停下来，你不仅失去了制造证据的能力，你还将无可回避地面对那个你一直在用运转来推迟面对的事实。

这里，可以借助一个从经验材料中浮现的术语来更精确地描述这个现象，但必须非常谨慎地使用它。在访谈中，不止一位家长使用了类似于“我知道这都是装的”这样的表述来描述自己的日常运转。这个“知道这都是装的，但还得继续装”，指向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它既不是典型的“自欺”——因为家长并没有真的被自己骗过，她心里很清楚那些打卡和检查的局限；它也不是单纯的“角色扮演”——因为在戈夫曼的意义上，扮演一个社会角色并不必然意味着你在内心里否定它，你可以认同你的角色，也可以在后台卸下它。但这里的运转，是一种长期被强制维持、不被内心认同、却又找不到替代脚本的表演。它既不是自愿的（像演员选了一个角色），也不是无意识的（像被意识形态蒙蔽），而是被一套制度性的安排逼出来、被日常互动的规范性压力持续维持、被缺乏替代选项锁定为唯一可行的出路。

如果一定要给它一个概念化的表达——这种表达不是为了凝固它，而是为了让它便于指认和分析——可以称之为“本体论伪证”。这个词要捕捉的不是“说假话”（家长确实做了那些打卡和检查的动作），而是“做出一个在存在论上不真实的存在声明”。每一次打卡、每一份被代劳的作业、每一组被美化的AI学习数据，都在声明一件事：“我正在以操控者的身份，有效地管理孩子的生成过程。”这个声明是假的，不是因为家长没有付出劳动，而是因为她付出劳动的那件事——以操控者的方式去管理一个生成过程——在存在论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身就是伪的。所以，不管你多么努力地执行它，你执行出来的每一份证据，都是对你自身存在状态的一份伪证：它把你证明成你是那个你并不真的是的人。

这个“伪证生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驱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个体内部的心理弱点——“我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而是来自制度层面的强制性：“你不制造这份证据，你就不是一个尽责的家长。”当一位母亲深夜在疲惫中代写了孩子的阅读思考，她不是在逃避存在主义的自由眩晕；她是在回应

一个无法被个体意志轻易撤销的社会强制：如果明天孩子的记录本被抽到是空的，被公开目光标记为“不够好”的，将不只是孩子的本子，还有她作为母亲的身份。萨特的自欺是个体可以自己选择不相信的——你可以对自己真诚。但本体论伪证不是个体可以单方面决定停不停止的——因为它不只是心理状态，更是社会实践中被反复产出的制度性效果。即使一位家长在哲学上完全觉醒、深刻接受“我确实不是操控者”，她回到家长群里，仍然会被那条语法所迫：不打卡就缺位，不规划就失职。她觉醒的内在真实，没有帮她换掉外部脚本里的任何一句台词。

（三）AI 时代：技术如何公开了不可操控性

在传统的家校互动模式中，家长可以通过亲自陪读、亲自讲解、亲自规划，来维持一种“我在操控”的幻觉。这种幻觉之所以能维持，不是因为操控真的有效，而是因为操控的动作——坐在孩子身边、翻着课本讲解、问“这道题懂了吗”——在形式外观上与操控者的标准姿态高度一致。没人能站在旁边看一个家长陪读，然后说“你这样根本不是在操控”。陪读本身就是操控的规定动作。

AI的介入改变了这一切。它以两种看似矛盾的方式同时运作。

第一，AI极大地提高了运转的效率。传统的运转是劳动密集型的——家长要亲自讲解、亲自纠错、亲自查找学习资源。AI把“教”这个环节的很大一部分劳动接了过去。孩子可以在AI上获得完整的解题步骤、生成范文、进行自适应词汇训练，比家长讲得更清楚、更耐心、更随时随地可用。从效率的角度看，这是革命性的：家长的“运转负担”被显著减轻了，她不再需要坐四十分钟讲一道数学题。

但第二，效率的提高恰恰剥除了那个维持操控幻觉的形式外衣。当家长不再需要亲自“教”的时候，她也就失去了那个最能让她感觉自己“在操控”的动作场景。她被退居二线。她的新位置，是监督AI使用——检查AI学习报告上的数据、翻看孩子与AI的对话记录、在后台设置学习计划。这个新位置，暴露了一件她以前可以通过亲自坐在孩子身边来模糊化的事情：她不知道孩子到底有没有学会。过去，她至少可以在陪读的仪式中对自己说“我在场、我在讲、我在管”。现在，她面对的是一组数据——完成率、正确率、学习时长。这些数据比“我坐在他旁边”要精确得多，也有更强的“证据感”。但数据带来的安心，很快就会被另一种经验戳破。

这里需要有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说明这种微妙的转变。以下案例来自对东部某省会城市一个双职工家庭的追踪访谈，聚焦于一位母亲与孩子在使用AI学习工具过程中的互动演变。

母亲陶璐（化名）的孩子小航，五年级，从一年前开始使用某款主流AI学习工具。最初的几个月，陶璐每天晚上打开AI后台，查看学习时长、知识点完成率、正确率趋势。数据一直不错：完成率经常在90%以上，正确率也稳定在85%左右。她感到很踏实——至少，这台机器在帮她盯着。但有一个周末的下午改变了她对这份“踏实”的认知。她偶然发现小航在用AI做阅读理解题时，是把整篇文章拖进一个翻译对话框里，先看中文大意，再回去做题。做题时如果系统判错，他就不停地换选项

，直到判对——然后截一张“正确率100%”的图，发到母亲手机上。陶璐盯着那张图和后台漂亮的“完成率”，心里冒出一个她之前一直避免去想的问题：这些数据，到底证明了什么？它们证明的是小航的学习在真实发生，还是证明了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已经比他母亲更懂得如何为一台监控机器制造一份漂亮的答卷？

这个问题的出现，标志着焦虑的升级。在传统模式里，家长当然也知道孩子会应付——抄作业、考试前突击、假装在看书——但那时应付的对象是人，有人的局限性，有漏洞可察。现在应付的对象是AI，是一套算法，这意味着孩子可以用更隐蔽、更高效的方式，去满足那个仍在要求他“做出在学的样子”的监控系统。而母亲，因为不再亲自参与“教”的过程，反而比以前更难判断：数据下滑，是不是只是应付的失误？数据漂亮，是不是应付得太成功了？她失去了传统模式中那种虽然低效但至少可以凭直觉感知的判断——那种从一个不耐烦的叹气、一支不断转动的笔、一个突然发亮的眼神中，隐约知道“这次他可能真的在懂”的线索。数据报告把这些全部都抹平了。它不是让家长看到了更多，而是让她在最关键的那个问题上——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在学——比以前更瞎了。

这就是AI时代的特殊效应。陶璐的困境，不是她个人判断力不足，也不是她使用方法不当；不是她用AI用得不对，而是她使用AI的方式——每天查看报告、监督数据、要求孩子截图——恰恰是那套“操控者”脚本在技术条件下的自然延伸。技术提供了更精密的监控手段，于是监控就变得更精密。而更精密的监控，并没有让她更接近那个生成过程——反而让她离它更远了。因为生成过程的痕迹——困惑、摸索、一遍遍错、一遍遍自己找到对的——不会出现在那份“正确率100%”的后台报告上。那个十一岁的孩子，已经精确地学会了：只要让数据好看，妈妈就不会来烦我。

于是，焦虑从“量”和“责”的层面，升级到了“真实性”的层面。它不再是“我怕我的孩子学得不够多”，不再是“我是不是管得还不够严”，而是：“所有这些管和学，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我们合谋制造的一场精密的表演？”当这个问题浮出水面，家长的不安就不再是针对具体绩效的担忧，而是针对整个日常运转的存在根基的质疑。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一个在同一技术条件下的反向现象，它极容易被忽略，却对理解松动的可能性至关重要。在追踪观察中，极少数家庭（通常是在某种特殊条件下——比如有一位本身就是教育工作者的家长，或者孩子表现出超常的自主学习能力）发展出了一种与AI的不同关系。在这些家庭中，AI没有被当作监控系统的高效版本，而是被当作孩子的私人学习伙伴。家长不检查学习报告，不要求截图打卡。孩子可以自由决定什么时候用AI、用它来做什么、怎么用。AI在那里，就像一个随时可用的知识源、一个不会以成人权威面貌出现的对话者、一个可以反复试验和犯错的沙盘。在这些家庭中，家长的角色已经从“确保AI被有效使用的人”，蜕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条件守护者”——确保孩子有一份安静的时间、一个稳定的节奏、一个安全的情感氛围，去跟那个工具建立他自己的关系。

这种放手之所以可能，不是因为这些家庭的家长更有“觉悟”，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微观制度环境暂时允许这种放手——比如，孩子的学校不强制要求AI使用记录作为家校沟通的证据；或者孩子恰好成绩优异，使得“没检查”不会立即被放大为“不负责任”。换言之，这不是一个个体觉悟战胜制度压力的故事，而是一个制度压力偶然减轻、从而让另一种可能性得以生长的故事。这些家庭的存在，揭示了AI技术的一体两面：它既可以被吸收为监控系统的升级版（这是主流），也可以被配置为生成资源的供给端（这是极少数）。哪一个版本被主流化，不是技术问题，是制度与话语问题。

四、如何松动：从裂缝的政治到制度的转向

如果前文的诊断成立——焦虑的根源不在于负担过重，而在于家长被锁入了一个存在论上自相矛盾的脚本——那么松动的路径就不可能只停留在个体心理调适或局部制度改良的层面。它必须触及那个脚本的语法本身。本节从三个层次来分析松动的可能路径，拒绝简单倡导“换一个新脚本”，而是试图追踪松动在现实矛盾中已经开始发生的那些微小的、非意图的裂缝，以及制度层面需要完成的语法转换。

（一）认知松动如何偶然发生

在经验层面，那些已经开始部分松动“操控者”脚本的家庭，其松动的起点往往不是一个思想觉悟的时刻——“我终于想通了我应该放手”——而是被日常生活中的偶然、外部条件或极端疲惫逼出来的一次具体的“停”。某一天，她没有检查孩子的作业；某一个学期，她因为工作变动取消了孩子的两个课外班。她预想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老师会严厉批评、孩子的成绩会一落千丈、自己会被其他家长侧目。然后她发现，灾难没有发生。老师只是随意问了一句，没有追责。孩子成绩略有波动，一个学期后自己回到了原来的水平。其他家长忙于各自的焦虑，根本没顾上审判她。

这个“没发生”的经验，在一个家长的认知内部打开了一道裂缝。她开始意识到：原来那套“你必须一刻不停地以操控者姿态运转”的叙事，并不是铁律。原来你不做操控者，天不会塌。这个认识不是来自某个权威的理论，不是来自她自己想通了一个道理，而是来自一次实际的经验——她因为偶然的、非意识形态的原因被迫“停”了一下，然后发现叙事的灾难预言没有兑现。那个“没有兑现”本身，就是对这个叙事的一个微小的证伪。

把这种个体经验放到更大的社会互动中去考察，可以看到一个松动的传播机制。在一个微观的家长社群中——比如放学接孩子时聚在校园门口的五六位母亲——当其中一位在私下交流中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我这学期基本没检查过他作业，好像也没什么大事”，而她没有被其他人以沉默或嗤笑排斥时，这个“被坦然接住”的时刻，就向在场的其他人传递了一个微弱的但真实的信号：原来“不制造伪证”在某个小范围内也可以是安全的。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分需要明确：这种个体层面的认知松动，不是解放的路径本身。不是所有家长都有条件“试一次停一下”。一位单亲母亲、一个在竞争极其激烈的学区里的家庭、一个孩子已经出现严重学业困难的家长——他们没办法承受“试一试”的代价。悖论对于处在结构脆弱位置上的家庭，比处在资源相对丰裕位置上的家庭，锁得更紧。因此，个体层面的松动经验不能被普遍化为一套可以推荐给所有人的“方法”。它真正的意义在于另一个层面：它揭示了松动所需要的条件——不是个体的觉悟，而是那种“停了也不会被惩罚”的安全感。而当这种安全感只在个别、偶然、临时的条件下存在时，它就不可能被大多数人稳定地获得。要让它从偶然走向普遍，就不能只靠个体撞开裂缝，而要依靠制度层面的语法转换——集体性地把“不制造伪证也可以是尽责的”这个句子，从一个私下传递的小小秘密，变成一种公开的、被承认的正当选项。

（二）制度松动的语法转换

目前所有旨在减轻家庭教育焦虑的政策干预——减负、限培、课后服务扩面——都遵循着同一个默认脚本的语法。它们试图通过减少运转的内容来减轻家长的负担，但从未质疑“家长是操控者”这一角色预设本身。减负政策砍掉了校外培训，但它没有向家长提供一套不以操控者姿态来面对孩子的叙事资源——于是，课外班被砍之后，家长只能亲自填补空缺，劳动回流了。课后服务扩大了学校的托管功能，但它的核心卖点仍然是“帮您管住孩子”——它安抚家长的逻辑依然是：您放心，有人在替您操控。它从未传递过这样一个信号：您不需要成为一个全时段、全覆盖的操控者，也可以是一个足够好的家长。

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松动，必须去做一件更难的事：它必须在政策的层面、在学校的日常沟通中、在教师培训的内容里、在公共舆论的导向中，公开地、明确地承认一个所有人都已经在日常互动中模糊地感觉到、但没有人被允许公开说出来的事实——教育是一个生成过程，它本质上是不可操控的。家长不是孩子教育的项目经理。他不能、也不应该被要求为这个生成过程的所有结果兜底。这不意味着家长不需要负责——负责仍然需要，但负责的内涵必须从“操控全过程”转向“守护生成条件”。

这个转向不是词句上的修饰。它涉及一整套默认语法的替换。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目前许多政策文件和学校通知中，“家长是第一责任人”是一个高频出现的措辞。这个措辞在法律和技术层面指的是家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责任，但它在社会日常理解中的默认解读，已经被三十年减负政策的累积效应塑造成了“最终操控者”——因为只有操控者，才需要为所有结果负第一责任。如果制度层面将这个措辞系统地替换为“家庭是孩子成长的首要守护单元”，那么默认语义就发生了位移：你提供的不是全面管控，而是一个有边界的、稳定的、有资源的守护条件场域。管控面向的是结果，守护面向的是条件。一个守护者，不需要每天检查孩子的作业来证明自己存在——她知道自己的存在体现在那个安静书桌的被保留、那个晚饭时不经意的询问、那个孩子愿意向她开口的夜晚，而不是打卡数据上。这个替换，不会自动改变所有教师和家长的行为方式，但它会逐渐松动那条将“尽责”与“操控”锁在一起的语法螺栓。它会为那些偶然发生的个体松动经验——那位偶然停了一下然后发现天

没塌的母亲——提供一个不再孤立的正当性外衣。

（三）守护者的日常：一种尚未合法化的实践形态

如果制度层面完成了上述语法转换，接下来必须面对一个最实际的追问：在这种新的正当性空间中，“守护者”具体怎么当？如果他不再依赖于日复一日的打卡和监督来维持“我在负责”的感觉，他每天在做什么？他与“放任者”的区别在哪里？对这些问题的任何回答，都不能被误解为一份操作手册——因为守护本身，正视不可操控性之后的责任承担，就不是一个可以被标准化执行的动作序列。它不是“从今天起每天做这三件事”，因为一旦它变成一套规定动作，它就又滑回了操控逻辑：只要我完成了这些动作，我就可以告诉自己我是好家长。守护者的日常，恰恰是对这种“用规定动作来证明自己”的思维方式的持续松动。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沉默。可以勾勒它的基本操作原则，不是为了给答案，而是为了划出问题域。

守护者的第一个操作原则：管的对象从输出切换到输入。“输出”是孩子学习的具体结果——分数、正确率、完成量、排名。“输入”是那些使生成过程得以展开的条件——一个安静的时间段、一份稳定的家庭节奏、一个孩子在遭遇困难时可以安全求助的关系、一份让他可以反复尝试而不必担心被审判的宽容。守护者的注意力，不放在“今天他做对了多少题”，而放在“今天他有没有一个可以不被打扰、按自己的节奏去面对这些题的空间”。这不是懒政。这意味着她需要学习一种新的观察方式：不再观察结果的波动，转而观察条件是否就位。这比观察结果要难得多——因为结果是有数字的、可追踪的、能给人即时确定感的；条件却是弥漫的、不易量化的、需要长期耐心才能感知其效果的。守护者必须承受那种“我做了很多，但我说不清我做了什么”的状态。这种承受本身，就是一种需要练习的能力。

守护者的第二个操作原则涉及一种特定的情感技能：在看到孩子犯错、迷路、走得慢的时候，能够分辨自己的焦虑——“他会不会因此而落后？”——到底是来自对孩子真实处境的关切，还是来自“如果他不领先，我作为家长是否失职”的社会压力。如果焦虑主要来自后者，守护者的修炼不是去压抑那份焦虑，而是学会在它浮现时认出它的真实来源——然后不把它转嫁给孩子。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意味着她必须在每一次想要冲进去“替他做”的时刻，停一下，问自己：我现在想替他做的这件事，是为了他真实的需要，还是为了让我自己对“我可控”的幻觉不被打破？

第三个原则涉及守护者必然会遭遇的新困境。她将不再能从外部获得“你做对了”的肯定。在操控者脚本里，尽责是有目共睹的——你打卡了，你陪读了，你在家长会上被老师表扬了配合好。守护者失去的，正是这个来自外部评价体系的持续肯定。她做的那些“守护条件”的工作——维护一个孩子可以自由发呆的夜晚、在他不想去课外班时替他在爷爷奶奶面前挡一次、在孩子考砸后先不问分数而问“你最近睡得怎么样”——这些，没有人会发消息表扬她。她将长期处在一个不确定自己“做

得对不对”的灰色地带，只能依靠自己脆弱的内部判断。这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被承认的代价：松动态度，不意味着进入平静。它只是换了一种更难、更孤独的方式去承担那份原初的责任。

最后，“守护”与“放任”的边界，必须在这里被明确画出来。放任是不提供条件、不设立边界、不给出反馈——本质上是从关系中退出。守护则恰恰相反：它设立清晰的边界（“这个时间是你的，我不会打扰”），提供持续的条件（“你需要什么资源，告诉我”），给予诚实的反馈（“我看到你最近在这件事上不太投入，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差别在于：操控者提供完条件之后，还要越过边界去管控输出的结果；放任者既不提供条件也不设立边界；而守护者提供条件、设立边界，然后停下来——把生成那个结果的动作，交还给那个唯一能做它的人。那个“停”，不是放弃，而是承认：我做到这里，是我的全部责任；剩下的，是你的自由。这个承认，不是一个教育学技巧，而是一种存在论上的诚实：你不是他，你不能替他生成他自己。你能做的全部，就是守护那个让他能够生成自己的条件场域——然后，接受他生成的结果不完全由你决定。

这个“接受”，是守护者日常中最难的那部分。因为它意味着，你必须准备好有一天，你的孩子在所有那些你精心守护的条件中，长成了一个你并不预期、甚至并不喜欢的人。他可能选择一条你不认同的路。他可能在某件事上失败。他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找到自己的方向。而在那些时刻，你没有任何“如果当初我更严格一些”的借口可用。你只能面对那个事实：你守护了条件，但他仍然是他自己。这就是守护的风险——它不提供操控者那种虚幻的因果回溯（“他不好是因为我没管严”），而是让你直接面对生成过程的根本不确定性。不是每个人都有意愿和能力承受这种不确定性。正因如此，守护者的实践形态，不能成为一种新的、被制度强制推行的“正确脚本”——它必须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被集体正当化的可能路径，让那些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偶然摸到这条路的家长，不再因为缺乏外部认可而被迫回到操控者的轨道上去。

五、结论：语法深处的锁

本文从“AI时代家庭教育焦虑为何在竞速终点消失后反而加剧”这一反直觉现象出发，追踪了“操控者”脚本的建构过程——三十年间减负政策在升学评价逻辑未变的条件下逐层累积，把家长从配合者推到了兜底者的位置——并论证了这个脚本与教育作为生成过程的不可操控性之间，存在着一个范畴性的错位。日常运转就发生在这个错位上。它的每一次执行——打卡、陪读、规划、比对、检查——都在同时完成两件相互矛盾的事：表面上，它提交了一份“我在负责”的证据，短暂地平息了外部追查和内部不安；骨子里，它制造了“我控制不了”的挫败，因为运转的精细化程度越高，它就越明显地暴露了生成过程对它说“不吃这套”的那个内核。前者驱动更多的运转来维持尽责的假象，后者在更深的层面累积焦虑。由此形成了一种越运转越焦虑、越焦虑越运转的自我锁定。

在这个机制中，日常运转蜕变为一种本体论伪证的生产线：家长被制度性地强制做出“我正在以操控者的身份有效管理孩子的生成过程”的存在声明，而这个声明在存在论上是虚假的——不在于她没有付出劳动，而在于那份劳动所执行的任务本身就是一个范畴错误的产物。AI技术在这个生产线中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它极大地提高了伪证生产的效率——更精密的数据、更漂亮的报告、更“科学”的证据——但同时也剥除了传统模式中那个维持操控幻觉的形式外衣（亲自坐在孩子身边讲课），从而将家长的不可操控性公开化了。焦虑由此升级：它不再是对具体绩效的担忧，而是对整套日常运转的真实性的根基性质疑——“所有这些管和学，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我们合谋制造的一场精密的表演？”

在松动路径上，本文拒绝简单倡导“换一个新脚本”的规范性呼吁。松动的动力，不在于从外部提供一个更“正确”的家长角色定义，而在于正视矛盾内部已经存在的裂缝——那些被偶然的、非意图的“停一下”所撬开的经验（“这次我没管，天没塌”），那些在私下交流中被接住的坦承（“我也没检查”），那些在极少数家庭中偶然实现的与AI的不同关系（把它当作生成资源而非监控装置的升级版）。这些裂缝本身不是解放，但它们标出了松动所需要的那个条件：一种“不以操控者姿态出现也不会被惩罚”的安全感的集体供给。制度层面需要完成的工作，是在政策措辞、学校沟通、教师培训和公共话语中，系统性地将“负责”的默认语法从“操控全过程”替换为“守护生成条件”——不是增加一种新的好家长模式，而是让那个已经暗中存在的、不以伪证生产来维持尽责感的实践形态，获得公开的、不再孤立的正当性。

本文的分析聚焦于城市中产家庭——这个群体既是家庭教育焦虑最密集的载体，也是“操控者”脚本在制度层面最完整运作的场域。必须承认，在不同的阶层、地域和学校类型中，本文所描述的机制会有不同的强度与表现形态。在资源匮乏的家庭中，家长可能更早、更直接地撞上了“不可操控”的边界，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缺乏有效制造伪证的手段——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可能更没有条件承受“停一下”的风险。在资源极其丰裕的家庭中，伪证生产的效率更高，体面的证据更多，焦虑在表面被运转的高效平滑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逃出了语法错置，只是裂缝被推迟到了更晚的时刻（孩子的青春期、成年后的独立选择），当伪证终于兜不住那个被压抑已久的真相时，那笔被推迟的账会一次性清算。资源的差异改变的是机制的显现节奏和表面温度，而不是它的存在本身——因为同一个语法锁着所有人：你都不能公开承认你操控不了。

本文的核心命题——家庭教育焦虑的根源，是一套制度性地建构的“操控者”脚本与生成过程的不可操控性之间的错位——可以在以下条件下被证伪。如果能够展示：（1）在一些社会中，教育责任同样被高度个体化地建构为家长的“兜底”责任，但社会对这些责任的默认脚本不以“可操控”为操作前提——例如，存在广泛共享的、被制度承认的叙事资源允许家长公开承认“我的孩子的成长不完全在我控制之中”而不丧失社会正当性——而该社会的家庭教育焦虑显著更低；或者（2）在同一社会中，随着制度层面系统性地完成了从“第一责任人”到“首要守护单元”的语法转换，大量家庭的日常运

转实践发生了可观测的转变（伪证生产减少、焦虑呈现不同的质态），而焦虑的结构性根源被重新指向其他未被识别的因素——那么本文的诊断将被部分或整体地修正。理论的检验，最终要寄望于一种尚未发生的制度实验：当我们真的公开承认了教育的不可操控性，焦虑会去哪里？它会消失、会转移形态、还是会暴露出另一层更深的语法锁？这个实验值得做，因为在它发生之前，我们至少该把它被欠着的名字说出来。